

林同济 著 / 译

形态历史观

丹麦王子哈姆雷的悲剧

复旦大学出版社

林同济 著／译 林骧华 编

形态历史观

丹麦王子哈姆雷的悲剧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态历史观 丹麦王子哈姆雷的悲剧/林同济著、译;林骧华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8
(复旦百年经典文库)
ISBN 978-7-309-12274-9

I. 形… II. ①林…②林…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悲剧-剧本-英国-中世纪
IV. ①C53②I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3156 号

形态历史观 丹麦王子哈姆雷的悲剧
林同济 著、译 林骧华 编
责任编辑/朱莉芝 杨博元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4.75 字数 396 千
201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274-9/C·329
定价:7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 例

一、“复旦百年经典文库”旨在收录复旦大学建校以来长期任教于此、在其各自专业领域有精深学问并蜚声学界的学人所撰著的经典学术著作,以彰显作为百年名校的复旦精神,以及复旦人在一个多世纪岁月长河中的学术追求。入选的著作以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为主,并酌情选录论文名篇。

二、所收著作和论文,均约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整理编订并撰写导读,另附著者小传及学术年表等,系统介绍著者的学术成就及该著作的成书背景、主要内容和学术价值。

三、所收著作,均选取版本优良的足本、精本为底本,并尽可能参考著者手稿及校订本,正其讹误。

四、所收著作,一般采取简体横排;凡较多牵涉古典文献征引及考证者,则采用繁体横排。

五、考虑到文库收录著述的时间跨度较大,对于著者在一定时代背景下的用语风格、文字习惯、注释体例及写作时的通用说法,一般予以保留,不强求统一。对于确系作者笔误及原书排印讹误之处,则予以径改。对于异体字、古体字等,一般改为通行的正体字。原作中缺少标点或仅有旧式标点者,统一补改新式标点,专名号从略。

六、各书卷首,酌选著者照片、手迹,以更好展现前辈学人的风采。

总 目

形态历史观	1
丹麦王子哈姆雷的悲剧	189
附录	363
林同济先生的学术思想	林骧华 365
林同济先生学术年表	林骧华 375

形态历史观

目 录

《日本对东三省之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序言	5
大政治时代的伦理——一个关于忠孝问题的讨论	7
尼采《萨拉图斯达》的两种译本(书评)	14
廿年来中国思想的转变	18
优生与民族——一个社会科学家的观察	23
战国时代的重演	29
学生运动的末路	37
力!	41
中饱与中国社会	47
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	55
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史观	65
士的蜕变——由技术到宦术	71
柯伯尼宇宙观——欧洲人的精神	76
寄语中国艺术人——恐怖·狂欢·虔恪	81
阿物,超我与文化	86
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	89
疾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	94
文化的尽头与出路——战后世界的讨论	99
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一个历史形态的看法	104
官僚传统——皇权之花	115
《文化形态史观》卷头语	121
民族宗教生活的革创——议礼声中的一建议	124
请自悔始!	129
我看尼采——《从叔本华到尼采》序言	133

中国心灵——道家的潜在层	吴晓真 译	144
思想检讨报告		155
中国的第二次解放：论思想和文学的发展近况	丁 骏 译	163
中国思想的精髓	丁 骏 译	171
莎士比亚在中国：魅力与挑战	丁 骏 译	181

《日本对东三省之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序言

自华盛顿会议以来，日本对华政策愈集中于满蒙，而其对外宣传方针亦另开新方向：（一）解释日本在东三省之一切经营及其目的，全属经济性质，毫无政治意义；（二）夸张东三省二十余年之经济展进，全藉日本之努力，而满铁会社之功绩尤为独一无二。其宣传之地域，则以美国为中心。其宣传之方法，则或用个人的名义向各方作非正式的谈述，或由团体的活动向大众卖大批的蛊惑。但其最有功效的方法，却为管辖国际新闻与雇佣美国宣传家。《远东时报》之武力(G. B. Rea)，满铁会社涉外科之钦尼(W. K. Kinney)，皆为虎作伥的美国人中之彰彰较著者也。就作者本人所知，其中钦尼诸人，除正式发表文章讴歌日人功德之外，尚时时非正式地向美国各界要人暗送“通讯”。衬映着政治的宣传，近来日本且有所谓“文化演讲员”者分赴驻美各领事馆，划区而游说。

一方否认其政治的野心，一方铺张其物质的建设，日本数十年来对一般商业化的美国心理可算是舞弄尽致。谓日本满蒙之肥料，谓日人为满蒙物质进化之原动力、指导者。每有一书出版，便是团团统计，色色画面，极辉煌灿烂之大观；一若我们二千八百万同胞之血汗农功，我们东三省之一切工商业建设，皆藉日人擎天之手而告成。在此巧宣传之积压力下，我们现看出近来美国之舆论界与实业家，至少对东三省问题，渐趋入“亲日”之方向。两年前纽约银行家暗中分担满铁会社借款一事，虽说是资本盈溢下暂求宣泄之举，然以视当年议筑锦瑗路时眈眈欲扑的美金圆，已显是前倨后卑之表示。在现时东三省之国际逐鹿场，英美两国渐由落后者变为旁观人。此后长途的奋斗，更是中国单骑苦抵日俄两国之夹攻！

本文自政治方面，叙述并分析日本二十余年来在东三省之铁路经营。我们益见得，日本所谓经济活动乃步步与政治活动相寻，而其实经济活动即是政治活动之本身。现时日本所巧号为“开发满蒙”即是明治“灭亡满蒙”之别名，更是昭和“灭亡满蒙”之最新毒手段。铁路经营仅为“开发满蒙”之一面。本文只就此一

面揭出个中之政治把戏。对俄国因范围之限制，一概从略。同丘之貉，本是相生相成。对此种日俄在东三省之根本关系，读者不可须臾忘！

一因田中积极政策之推行，二因中东路所引起之中俄纠纷，东三省问题已惹全国之注意。最近在日本西京太平洋国交会议中，该问题乃成为讨论之中心。事关东亚和平，尤关我国生死。其情势之严重，正是与时俱长。日俄的洪水本来日高千丈；飘荡欲淹的中国，有如逆流行舟，不进则退。穷究到底，我们若求保东北河山，最后胜利，绝不在空腔的呐喊，亦不在外交的争执，乃全在实际的努力与真相的创造。数十年来内讧外患之国家，生气磨殆尽；对四疆屏障，几漠不关心。而所恃以壮我边色，固我主权者，乃在数十百万无衣无食、号哭出关之灾民！此最可值我青年们深思之一点。

本文对编年一层，采用民国纪元为单位。对民国以前之年时，则以“民前”两字为识。编年之用意本在表示历史上“时间的距离性”。袭用前代帝王年号，不免杂乱无章。采用耶教西历，又觉彼此背景不同。现时国内各机关团体之文书案牍，既尽用民国纪元，则按民国纪元推算，似为最当。此外，中国地名亦时时改变。本文务求采用现行名称。但于直接称述他书或抄录公文之处，则概依原文。五花八门的中国地名、人名与编年例，实在有统一化之必要。想此是中国出版界之同感。

作者因环境关系，未能得国内“直接的史料”。本文内容大半根据英文各书籍。缺误之处，在所难免。唯读者改正之。东三省研究，在日俄两国已是无微不至，在我国却尚着手未遑。此后，除参校各国书籍外，我们当筹备“自家的资料”。实地之调查，事实之统计，前程漠漠，大有待于青年们之努力；时已晚，危机已迫，我们不可不兼程疾趋。本文寥寥几章，只当作一封告急书也可！十余年来我们青年揉作一团，死傍着黄河长江两畔，过其拥挤倾轧的生活，毫不知环绕长城以外，东西横亘，还有两倍于十八省的江山。中原灾民，今已先驱往矣！大中华生命已点缀遍白山黑水之间。而同时在天山南北之新疆，亦开始见新文明之创始。我们落后者，绝不容再事踌躇，徘徊路左！

民国十九年三月三日

林同济自序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原载《日本对东三省之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10月）

大政治时代的伦理

——一个关于忠孝问题的讨论

四月十六日昆明市各界在省党部举行民众讨逆大会，我陪在几位名流的末座，作几句关于中国文化的演讲。

我当时曾提出三点平凡之见。（一）是谈到中国“孝为百行先”的流弊，主张我们此后应当以忠为百行先。（二）是谈到中国“猎取功名”观念的流弊，主张代以“创造事业”观念。（三）是谈到中国“容忍苟安”的习气，主张此后应当特别注重“勇”的提倡。

后来有署名“迪身”者在报上发表文章反对我的意见，他以为忠孝本一贯，我们尽可“沿传统之观念，仍曰孝为百行先”。按他那篇文字本身价值，我们实无费神辩论的必要。但是自另一方面看去，他这种论调实可象征近年来乘着各种机缘而暗里抬头的旧势力。在这方面看去，我们却觉得此中却有一论之必要。并且忠孝问题确是我们二千年来实际生活上待决未决的大悬案。在某立场观察来，我们一谈到忠与孝的关系，我们便直挖着中国文化的核心，牵连到中国文化的命运。此空前的抗战局面，我们对任何种问题必须具空前的锐眼与决心。我们应当不避现实，奋把中国整个的文化，下一个彻底的、忠实的再一度反省、再一度估量。我们正无妨以忠孝问题为我们反省的起点。

我们不要怕反省。抗战需要自信力，但是自信力必须建在“自知”之上，建在“知己知彼”之上。唯其自知之明，才能有自信之深。此中固有一番连带性在。我们在此死中求生的关头，容不得败北派的盲目自馁，亦容不得义和团式的盲目自夸。战是个现实，是个力量伟大的现实。战的需要将要迫着一切的一切随它转移。也就是说战的影响将要使国人的整个生活，变更旧惯。不管你个人是欢迎或是反对，只需我们这个民族是有“灵机”、有生气的话，我们的文物制度、我们的思想与人生观，迟早总要随着此次抗战的大潮流、抗战的大需求，而蜕新而变

换。现在问题就是：盲目无见的被动的变换吗？还是看清途径的自动变换？我们主张对中国文化的反省，并不是喜欢多事，乃是在战的现实、战的必需与追求下，企图一个自动的变更，健全的适应。

但是这种健全适应的企图，虽是因抗战而发生，却并不当只以对付一时战局为目的。乃应当探求一个较普通、较根本问题——如何能使中国配做现代世界上的国家。因此我们本篇的忠孝论，也并不只是一种战时特有的伦理观，乃是现代国家应有的、必须的伦理观。我无以名之，名之曰大政治时代的伦理。兹且把我的立场简单的申说如下。

（一）我承认现代世界是个大政治世界。我不愿谈八千年前的太古洪荒，亦不愿谈八千年后的所谓“大同”世界；我所注意的是此时此世的现实。对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我以为我们当有切实、忠实的认识者数点：

（甲）它并不是缓带轻裘、揖让上下的世界，乃是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

（乙）这个竞争的根据，最重要的是“力”，不是所谓“法”与“德”。

（丙）竞争力的单位，最主要的、最不可缺的、最有效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家庭，也不是教会或阶级……换言之，最主要的竞争是国力与国力的竞争。

（丁）这个国力是正在急速的走向全体化。就是说，国内一切精神物质的力量，一方面极端地分头发展，一方面又极端地组成一体。所谓大政治者，就是国与国间凭着彼此极端全体化的力，以从事于平时的多面竞争与战时的火拼决斗。这不是我故作恶语。大家只需不要幻想，只要定眼看着现代世界实际政治的趋势，对此语必表赞同。

（二）在此种以全体化国力为竞争单位的世界，最重要的是每个人民都要成为国家的有机体的一分子。个个“人民”都得练成一个得力的“公民”。换言之，在大政治世界上公德比私德重要，政治德行比任何德行都重要。这不是说公德与私德必相冲突，两者往往相成，但有时却相冲突。所谓公德重于私德者，就是说两者冲突之时，我们当全公德而灭私德。两者往往并行不悖，但是如果有相悖的倾向，我们当存公道而舍私德。

（三）一切的公德，一切的政治德行之中，忠为第一。所谓忠者，不是古代忠于君或忠于朋友的忠。忠于君或忠于朋友的忠不免含有五分私德意。大政治时代的忠，绝对忠于国。唯其人人能绝对忠于国，然后可化个个国民之力而成为全体化的国力。忠是国力形成的基础，形成的先决条件。忠是一种纯政治的德行，与伦理原则有时吻合，有时冲突。例如本国与他国冲突时，即使在伦理上本国未

必是,他国未必非,我们也履行政治道德的需求,必须为本国作战,与他国拼杀。我们为求对得住国家,有时乃对不住人类。然而现代国家的组织,就是根基于此纯政治的德行——忠——而建立、而运用、而维持、而发展的。换言之,就是忠为百行先。这并不是我个人新奇之说,乃是现代各国实际上认为当然推行、必须推行的根本大计。其实现代事实所指示,不但政治时常脱离伦理的羁绊,并且伦理本身大有日趋“政治化”的倾向,日趋“国家立场化”的倾向。自国家立场而有利的便是“好”,便是“是”;自国家立场而有害的便是“恶”,便是“非”。国家的利害,变成伦理是非的标准。这在往时超然的伦理眼光看之,是何等的“不道德”“反道德”。然而大政治时代需要大政治的立场。国力竞争局面,需要政治化伦理,不要伦理化政治。换言之,忠不但为百行先,乃不可遏止的逐渐成为百行的标准,一切价值的评员。也就是说,大政治时代的伦理乃含有“反伦理”倾向之可能。

总而言之,大政治时代是以全体化的国力而从事于国际竞争的时代。在此时代中,必须树立“忠为第一”主义,必须以忠为中心以建立我们全民族的思想系统,以忠为基础建造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这是我主张忠为百行先的立场。两者不能并立,既是忠为百行先,则孝当降格,在此立场下,我反对孝为百行先。

我此刻要声明的,我反对孝为百行先,与“五四”运动时代“非孝”之说有点不同。“五四”时代的非孝大抵以个人解放、个性解放为据本、为目的。我的主张却是以国力组合与政治集体为立场。“五四”时代正值西方欧战之后。欧战后的西方政治与思想是一种欧洲文化的支流对其本流的暂时反对,时势到了今日却已把西方的现代文明的主要意义,赤条条显在目前,绝不容我们再事“自催眠”指鹿为马。三百年来来的欧西文明的发展自大政治的眼光看去(大政治眼光是对现代世界生活最重要、最不可缺的眼光),只是国家力量的发展与集中。个性解放自现代的现实看去,可说是国力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力集中的导线。就中国二三十年来经历而说,“五四”运动的解放个性正是我们从今而后国力发展运动的先锋。如果我们的立场及目的与“五四”时代不同,那是我们随着时代车轮的前进,把“五四”运动向前一步推行;也可说是应大时代的呼唤,把我们酝酿未熟的思想猛向现世界的本流合奔。在这方面看去,个人与集体之两宗,质虽异而用则合。他们对过去的“孝为百行先”的家族主义、宗法制度,皆同样地采取对立的态度,革命的精神。

我们不反对孝:如果孝只作为“敬爱父母”解,我们不但不反对,并且赞成。

无奈中国之孝,并不是一种纯净的德行,一种自然人情的流露,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哲理概念,乃是二千余年来特殊阶级,因其特殊渊源与特殊利益,而矫揉造作,铸成的一种思想系统,而更铸成的一种庞大复杂的社会制度。如果像迪身君一般,只背诵三四句圣人之言,而便指为“孝”尽在是,那是太看轻我们过去数百代祖宗的脑力能力了!我们对孝并无什么惊人的主张。我们只主张把它简单化、平民化,把它“天真化”。我们只主张“返真”,只主张把那些假的、伪的、虚张的、辉煌的、物质的、肉体的、血统的、迷信的一概取消,好留下那可爱可实的纯净敬爱之赤诚献给父母!

其实我们期期所不能不争执者,只是“先”之一字。我们并不反对孝,真而朴的孝。但是我们不能不反对任何人在这个时辰,还在那儿“埋头沙里”把孝高高抬起,放在百行之“先”。你孝敬你的父母,本是你的私事,本是你“自尽良心”的事,何必扬扬然向社会鼓动,大吹大擂,自鸣为惊天动地的大德呢?谈到这里,我们却谈到问题的核心。原来孝之为物,是个私德,是子女私人对父母所自认为当行的一种精神上或物质上的责任。本是一家之事,不必惊动外人。那些二十四孝及其他世传的割股尝粪等事,且莫管它是迷信行为与否,根本上就是那般王某庚某的私事,何必我们动驾来替他向社会鼓吹,向后代宣传呢?人家房中闺内的琐闻,偏要由政府或社会人士殷勤地、炫耀地为他们立坊著册,高标为民族行为的模范——这确是十足地显出宗法社会里难产出大派头的人物。他的眼光与想象力死不超出萧墙之内,总喜把他的私事当作公事看,让大家齐把家事当作国事办!公私辨别不清。私德与公德胡混。也许在那专制时代,在那文人与士大夫支配的社会里,这种看法与办法有它特别的作用,有它意外的用意。但是在此大政治临头的时代,哪能再堪此子女小派头的把戏?大政治时代,政治德行为先,公德为先,最重要最根本的,忠为一切先。孝乃私德,它固有它的地位,但是坐第二把交椅尚嫌不胜任,莫说是要占百行的上风了!各国人往往认中国人无政治能力。这话当否,且莫论。我所要问的,二千余年溺于“私德的伦理观”的中华民族,可以了解此二十世纪纯政治时代的意义?可能于此空前的民族战之中,领略些崇拜公德的精神,体验些“政治化伦理”的雄心?

以孝为百行先,便是以孝为国民伦理的基础。绕着孝的观念,自然而然地要建成一个特殊的、“一贯的”思想系统。它不但以孝为百行先,它还要把孝字来解说一切人生的价值。所以祭义有曰:“居处在庄,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迪身君于此却说得不错:“夫莅官战阵已属

乎忠之范围,而必纳之于孝者,盖举孝以赅忠。”这种“必纳之于孝”的强手段,我们当注意的。它也许是古圣哲企图以孝助忠之威,坚忠之志。它也许是古圣哲看出孝的范围太狭小,孝的用途有不逮,于是把孝的意义勉强地扩大,而包括家庭以外的公德。但是它的最大意义,是要以孝解释一切的价值。夫唯一一切的价值“必纳之于孝”然后孝的思想系统成。此于现代各国的趋向,要把一切价值必纳之于忠一样。孰优孰劣,是玄理上不可决的问题,我们不谈。我们所要穷究的,哪一个适应于现代的生存?分明时代要求是公德,是政治德行,是忠为第一。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奉忠为第一,而偏要向那宗法社会的残余堆里,抓出那孝的一套,然后把忠纳之于孝,然后再评三议四,看看这个忠是否有合于孝,然后才敢下个判语,决定这个忠究竟是否“有当”,是“合道德”呢?为什么我们必要把忠放在孝的膀子下?为什么我们必要苦向孝之中、孝之下寻出忠来?为什么我们不让堂堂之忠独立于光天化日之下以直接应付此大时代的来临,而偏偏要把这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公道,硬当作儿女私德——孝——的注脚呢?

私德为先,公德为后;私德为主,公德为副。这是二千年来,我们宗法制度下的伦理之不可避免倾向,不可避免的流弊。二千年来社会的整个现实与二千年前二三圣人的训话正不必相符而竟可往往相背。谈到此地,忠孝不两全的缘故,可以明了了,忠孝的冲突是中国历史上永未解决的事实。尽管二千年前的圣哲登席高呼“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苦喊大家“移孝非忠”,却是实际上我们观察社会一般人的行为,总不免觉得在我们家庭主义的绑缚下,“移孝”一功夫,难赛“移山”;孝子之门,忠臣鲜焉,其中原因就是由于中国不但以孝为中心而组成一套思想系统,还凭此思想系统而组成一批“吃人”的礼法,构出一个庞大的宗法社会,复杂的家庭制度。这个制度又自有它实际上内在的因素,使它实际上的逐日发展与原初的理想论训愈离愈远。本来实际与理想的差别,在人类文化史中不一其例。中世纪末马丁·路德所反抗的罗马教会与二世纪的原始耶教,实有天渊之别。中国的家庭制度何莫不然?反而观之,制度的本身也不是全不受理想的影响,思想自有极大的力量的。古圣贤学说之中,实含有不少种子,为后天制度上积弊之原,甚且成为制度上积弊之护符。那些“父母在不远游”“孝子不登高,不临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孝的哲学,乃与经传“明哲保身”之训混合,而在那家庭势力膨胀的环境中,竟结成一套“怕死的人生观”磅礴于“神州”的全部!至于那些“莅官不敬,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的公德化的孝论,欲在历史上求其实行者乃亘千秋而落落如晨星。中华民族观念与政治存在,

尚能屡经大难勉强支持者，也就靠此少数又少数的成仁取义的英雄。然而大政治时代的迫来，所需要的是全国国民个个都提担起英雄的责任，哪还容把此大好河山尽托诸几个人的手里？对此空前的局面，我们迎头赶去，还恐不及，哪里有时光迂回萦绕，模仿那闭关时代学究们的老态，来徐敲孝子之门搜寻出一二忠臣呢？老学究的办法是要教孝而求忠。我们的提议是教忠而求忠。其实教忠而求忠，犹恐不给，况乃教孝而求忠，则宜其十扣世俗所谓孝子之门而不免九度弛然返也！

忠与孝二千年来的实际冲突，既不是二千年前圣人口头上训为“一贯”之所能掩，也不是这些圣人之所能防，则凡现在负责指导我们国民思想者不容不对此紧加注意。历史的经验显然告诉我们：二者往往难兼。我们当有警惕。事到今日，我们已不堪盲目地再蹈古人之覆辙。让我们大家认清主要目标，决然把孝放开少谈，多多提倡忠字。其实在此“孝的制度”积弊丛生之下，我们最好的办法是干脆把“孝”的一套旧理论旧制度轻轻地束之高阁，只留下“敬爱父母”的干净四字作我楷模，好把这民族所有的有限精力直接灌输到“忠”的伟大工夫上！

细察孝的“危险性”，即在迪身君所举赵苞、王陵两例上，便可反证出来。在现代西方各国，两军对战，绝对无人会异想天开，来设法执敌将之母以胁其降。盖在忠为百行先的社会，国运为重，私情为轻。那些执母胁降的手段，无疑的是缘木求鱼，一切落空。而独在我们的中国，像那项羽挟王母以招王陵，鲜卑劫赵母以胁赵苞者，几于史不绝书。可见孝的势力之大，不但是与忠难两全，而且“用孝破忠”竟成为对我民族可望走通的战略！这是何等可虑！再者，王陵、赵苞之守忠不降，未必不是仰承母命尽忠之故。如果二母不明大义，王陵、赵苞之是否弃忠全孝，正未可知。曹操执徐母以挟徐庶，徐庶立刻“方寸乱”，弃刘备而归母。卞庄子为欲全身以养母，战而三北。你看我们这个单弱的国家，碰着这般“养母全孝”之徒，果能挡得住它们几多番的弃职，几多番的逃阵，而不循底于亡呢？

我说中国重孝轻忠，便是说它以孝为先，以忠为后。孝为百行先之说，自汉以后，坚牢不拔的深入民间。而忠之一字，无形中成为次要之次要，结果，大家的心目中总认得不孝之罪大于不忠。所以在我们的社会里，逆父母者乡党不齿，而卖国者反可取得一般亲友的优容。抗战以来，我们的头脑已显然地得到一番改变。抗战愈久愈烈，我料知“忠为百行先”终要成为全民族深深体验深深了解的